

· 文学专业 ·



A SERIES OF WORKS OF SUPERIOR MASTER THESIS OF FAMOUS UNIVERSITIES IN CHINA

中国名校优秀硕士论文丛书

中国人民大学

卷

程光炜 主编



山东友谊出版社

· 文学专业 ·



A SERIES OF BOOKS OF SUPERIOR MASTER THESES OF FAMOUS UNIVERSITIES IN CHINA

中国名校优秀硕士论文丛书

中国人民大学

卷

程光炜 主编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名校优秀硕士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卷 / 程光炜主编. —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5.11

ISBN 7 - 80642 - 935 - 2

I. 中... II. 程... III.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汇编 IV. G64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2103 号

中国名校优秀硕士论文丛书

中国人民大学卷

程光炜 主编

主 管: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755 82098756

发行部 (0531) 82098035 (传真)

出版发行: 山东友谊出版社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70mm × 230mm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179 千字

定 价: 24.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总目

一个空间的历程

——以《新青年》“通信”为中心

刘震(1)

延安“文抗”研究

程鸿彬(37)

从《清华周刊》十年看清华文学传统渊源

王云霞(85)

叙事性问题与90年代中国诗歌写作

张隆(123)

体制化的前夜

——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研究

袁诗宁(149)

“文革反思”写作中的存在主义影响

——刘震云小说的历史——政治阐释

刘稀元(177)

农村写作在文化权力关系中的调适

——文化研究视野里的《三里湾》与《创业史》

赖洪波(201)

中国人民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中文) 一个空间的历程：

以《新青年》“通信”为中心

(英文) The Course of A Space:

Focusing on New Youth's Column "Letters"

作者：

(中文名) 刘 震

(英文名) Liu Zhen

目 录

绪论:《新青年》·媒介·公共空间	5
第一章 事务咨询时期(第一卷)	8
一 “通信”与“事务咨询”	8
二 《青年杂志》:“青年”与“修养”	10
第二章 “编读讨论时期”(第二三卷)	13
一 “通信”与“读者论坛”	13
二 “编读讨论”:形式与功能	15
第三章 “同人论坛时期”(第四五六卷)	18
一 “同人刊物”:内/外有别	18
二 命名的意义·复信附跋的形式·讨论的正式场域	21
第四章 萎缩终结时期(第七八九卷)	24
总论:《新青年》·政党·公共空间	28
附录一:《新青年》“通信”栏信件统计表	33
附录二:《新青年》4—9卷“通信”栏主题列表	34
参考文献(略)	
后记(略)	

绪论：《新青年》·媒介·公共空间

毫无疑问，在任何意义上《新青年》^①（第一卷叫《青年杂志》）都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它于1915年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而数年后它颇具吊诡意味的终结，也象征着那场意义深远的文化改造运动作为一个统一的“运动”的瓦解。正因为如此，这里成了一个曝光过于强烈的地带，思想史、政治史、文学史等不同学科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把它纳入各自的叙述之中，制造出众多既熟悉又陌生的《新青年》形象。出于对学科分化可能割裂对象的警惕，有论者提出应将《新青年》还原为“杂志”，从“杂志研究”的角度，“关注《新青年》的出版与编辑，它的编辑者及方针的不断转换，撰稿人的构成，杂志运作中的‘策略’，杂志的栏目及其相关的文体等”^②。但这种反思同样似是而非，因为它并不能清楚地告诉我们：何谓“杂志”？这一命名背后预设的意义结构是什么？关注出版、编辑、栏目这种研究方式本身的前提和意义又是什么？其实，问题并不在于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去观照同一个对象，而在于观照的方式。迄今关于《新青年》的思想史、政治史、文学史研究，虽然角度各异，但其研究方式基本都是把《新青年》只当作一个“资料库”，根据各自的主题诉求搜索、抽取、编排相关文献，似乎刊物只是一些材料的杂乱堆积，而研究正是要赋予它们秩序和意义。但问题是：刊物是否真的只是一个“透明”的媒介？

报刊作为一种现代媒介，可以有不同的研究方式。^③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④，强调媒介的意义并非植根于媒介所承载的内容，相反，它来自媒介形式本身，正是技术媒介的形式及其变化塑造了整个现代性的历史。戴安娜·克兰也认为：“传送意义的方式与被传送的意义同样重要。”^⑤她把媒介看作一种“社会活动场所”，“这种社会活动场所的特征影响进入这个文化空间的内容的性质，影响到内容的性质如何相应地受到它在这个语境之中表现的影响，以及公众对它的反应”^⑥。话语的意义不是自明的，而是被话语生产和流通的具体形式所构造。任何一篇文章、一个观点都应该被置于刊物这一“小生

^①本文讨论的《新青年》指《新青年》月刊，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终刊于1922年7月1日，共9卷54期，不涉及后来的《新青年》季刊和不定期刊。

^②李宪瑜：《〈新青年〉杂志研究》“内容提要”，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0年。

^③英国学者尼克·史蒂文森把媒介文化研究归纳为三种范式，即批判研究、受众研究和传播媒介研究。本文在方法上接受了传播媒介研究的启发，注重媒介形式的意义，而要考察的问题，即“公共空间”则属于批判研究的内容。本文正是想通过沟通不同范式的方式，为自己的论述获取一个更恰当的研究视点。参见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

^④（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第33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

^⑤（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第80页，译林出版社2001年。

⑥(美)戴安娜·克
兰:《文化生产:媒体与
都市艺术》,赵国新译,
第20-21页,译林出版
社2001年。

⑦(德)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
型》,第32页,曹卫东等
译,学林出版社1999
年。

⑧曹卫东:《交往
理性与诗学话语》,第
116页,天津社会科学
出版社2001年。

⑨(德)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
型》,第22页。

⑩(德)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
型》,第3页。

⑪(德)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
型》,第4页。

⑫莫利:《电视,观
众与文化研究》,转引
自陆扬、王毅《大众文
化与传媒》,第94页,上
海三联书店2000年。

境”中来考察,其意义只有在刊物具体的组织结构和意义关系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把《新青年》看作是一种文化生产的方式,是一个现代空间的发生器,从而在文本层面关注《新青年》在文化生产和空间开拓中的具体机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功能关系及其运作方式。如果说过去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刊物“说了什么”,那么本文则侧重于关注它是“如何说”的。具体讲,本文尝试从《新青年》的通信切入,考察“通信”栏目与《新青年》刊物整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新青年》如何型构了“通信”的形式和功能;另一方面,“通信”又如何反过来参与了《新青年》整体形象的塑造。

在报刊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为我们提示了一条富有启发性的思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⑦。这一社会范畴的出现,“不仅标志着现代社会的出现,更标志着现代性的萌芽和发展”^⑧。公共领域的构建,仰赖于一系列社会文化机制的支撑,报刊正是其中最重要的机制之一。哈贝马斯指出,作为“公众”中坚力量的“市民阶层”,“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阅读群体”^⑨,正是“随着这样一个阅读公众的产生,一个相对密切的公共交往网络才从私人领域内部形成了”^⑩。公共领域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以阅读为中介、以交谈为核心的公共交往”空间。^⑪莫利也认为:“公共领域的体制,其核心是由被报纸及后来大众传媒放大的交流网组成的。这个网络使由艺术爱好者组成的公众得以参与文化的再生产,也使作为国家市民的观众得以参与以公共舆论为中介的社会整合。”^⑫

近年来已有不少论著尝试把“公共领域”概念引入中国近世历史的研究,也引发了对其理论适用度的激烈争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公共领域”是一个带有强烈西方经验色彩的概念,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的历史语境。因为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历史上讲,西方近代以来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元分化对峙都是其存在的前提,但这种清晰的分化在中国并没有出现,就文化观念而言,中国人对“公”/

“私”关系的理解也极其暧昧,与西方的“公私分明”的传统大相径庭。^⑮其实,哈贝马斯本人一开始就已经强调:“公共领域”是个“历史范畴”,“不能把它和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市民社会’的独特发展历史隔离开来,使之成为一种理想类型,随意应用到具有相似形态的历史语境当中”^⑯。因此,本文不打算介入中国是否存在“公共领域”的本质主义之争,而是赞同李欧梵先生的策略,即把“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改造为复数的“公共空间”(public space),把它看作是现代社会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注意对文化制度形式的演变作单独的考察。^⑰既不同于已有研究着重关注近代基层组织和自治团体对国家权力的分享,也区别于哈贝马斯本人从政治功能角度强调“公众舆论”与国家之间的对抗性关系,本文将把视点落实到一个具体刊物,通过对它文本形式的分析,透视由《新青年》开拓的那个“公共空间”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新青年》作为一种“传播信念的报刊”^⑱，“通信”栏目无疑最充分地体现了它作为“公共讨论机制”的性质,对其由“大众”而“精英”而“政党”之演变历程的梳理,可以帮助我们廓清《新青年》作为一个“公共空间”是如何被建构起来,如何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发生器,最终又是如何被政党意识形态所瓦解,以及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利用报刊这一印刷媒体,营造自己的言说空间,发出一种既不同于官方又不能归入私人的“社会”的声音等种种问题。

出于对“历史性”和“复杂性”的考虑,本文以下将以《新青年》“通信”栏目为中心作分期考察。^⑲

^⑮这种研究和论争主要出现在美国中国学界,魏斐德、罗威廉、黄宗智等人的论辨论文,见邓正来,(英)J. C. 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第371-44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相关研究的述评和分析,见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第100-143页,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⑯(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1页。

^⑰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拓——从〈申报〉“自由谈”谈起》,见《现代性的追求》,第3-4页,三联书店2000年。

^⑱(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221页。

^⑲一般认为,以《新青年》的“北上”和“南下”为标志可以把它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前三卷为第一期,四到七卷为第二期,最后两卷为第三期。见陈平原《回眸〈新青年〉·序二》,张宝明、王中江主编《回眸〈新青年〉》,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考虑到刊物本身的一些变化,本文采用的是李宪瑜的分期法,第一卷为第一期,第二三卷为第二期,四到六卷为第三期,七到九卷为第四期。见李宪瑜《〈新青年〉杂志研究》。

第一章 事务咨询时期(第一卷)

一 “通信”与“事务咨询”

《新青年》上曾登载过一则前五卷合订再版的广告,其中说:

《新青年》开手就注意“通信”一栏,因为通信可以随便发表意见。所以那通信栏里真有许多材料现在也还不能不看的。^⑮

^⑮《新青年》七卷一号。

“通信”是广告中提到的惟一个栏目,可见《新青年》编者对它的推重,尤其肯定了“通信”栏可以“发表意见”或者说“讨论”的功能,而这也正是杂志创刊时的初衷。在《新青年》的创刊“社告”中专门有一条:

本志特辟通信一栏,以为质析疑难发舒意见之用。凡青年诸君对于物情学理有所怀疑,或有所阐发,皆可直缄惠示。本志当尽其所知,用以奉答,庶可启发心思,增益神志。^⑯

^⑯《新青年》一卷一号。原文无标点,本文引用时酌加。下同。

这既是对“通信”栏目的承认,也是一种规划。读者固然可以自由来信,但重点还是应该落在“质析疑难发舒意见”上。但《新青年》一开始的实际情形却与之相去甚远。

《新青年》第一卷的通信无论数量还是篇幅都很少,其中第五号甚至付诸阙如,这在前六卷中总共只出现过两次^⑰。综观“通信”性质,或者对刊物提出要求和建议,比如要求批判筹安会(一卷一号王庸工),建议设立“介绍书报”栏(一卷三号李平);或者对刊物言论有所反馈,比如关于“佛法”(一卷二号李大槐),关于《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卷四号张永言),关于《东西民族根本观念之差异》(一卷五号张永言)等。但更多的则是对读书、就学等实际事务的咨询,比如上海有何好学校(一卷一号章文治),上海有无法文学校(一卷二号李平),自修“中文洋文及算学”如何着手(一卷二号王珏),学习逻辑学的入门

^⑰另一次是六卷五号(马克思学说专号),当时《新青年》因为“五四运动”和陈独秀被捕而中断出版,该卷由李大钊在巴黎五峰山编辑完成,不登通信的情况似与此处不同。

书(一卷三号吴勤,一卷六号姚孟宽),上海有无学习“拳术”的地方(一卷四号穗),如何学习英文(一卷四号沈伟)等。本卷通信总共只有十四封,这类书信就占了七八封之多,使得“通信”栏目实际上发挥着“事务咨询”的作用。

尽管未能完全落实“质析疑难发舒意见”的规划,但这些通信已经确立了读者/编者之间问/答的基本通信形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青年》一卷四号、五号连续刊登了张永言与陈独秀关于欧洲文艺进化程序问题的通信,这意味着他们已经突破了读/编之间一次性的问答关系,这种“编读往还”的形式显然有助于确立以讨论为主的通信模式,为讨论的深入和展开提供了可能。

面对琐碎的事务咨询,陈独秀有信必答,态度平等而热情。一卷二号李平投书询问上海的法文学校事,顺便提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一书,陈独秀在回信里就用了不少篇幅引经据典地比较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与达尔文的“竞争论”之异同,以至于后来李平称赞道:“谆谆不倦,足见记者之热心教诲。”^②一卷六号辉耀来信询问六事,但都是“吸灰尘有何害于卫生”、“手指足趾之爪,因何自行脱落”之类的问题,连他自己都觉得似有不妥,特意补充一句:“先生不以唐突见拒,则幸甚。”陈独秀不但一条一条地详细作答,而且还郑重其事地表示:“承询各节,于生理卫生极有关系”。陈独秀的这种态度,不应该只理解成刊物初创,为争取读者的“无奈”之举,因为一卷三号曾有一封陈独秀致吕君的复信,原信却没有刊出,原因是来信虽然“用意甚佳”,但有“增社会消极之念”的嫌疑,“故未登载”。也就是说,“通信”这样的栏目是读者和编者共同构造的,陈独秀作为编者,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他的独立性和意向性,来信刊载与否回复与否都包含着他对通信价值和意义的甄别。大量事务咨询类书信的刊登和耐心的回复,表明事实上陈独秀本身即已经参与了对“通信”之“咨询台”功能的塑造。“通信”栏这时的情形即便不完全是他的初衷,但至少也是被他认可的。如果联系同期《新青年》的其他栏目,我们将会发现“通信”在其中非但不显得“异常”,而且还与刊物当时大众化的整体形象相当合拍。

^②《新青年》一卷三号,“通信”·李平致陈独秀。

二 《青年杂志》：“青年”与“修养”

关于早期《新青年》的形象,有论者认为:“《新青年》从一开始便提出了反对封建主义主张民主主义的口号。”并举《敬告青年》的“六大主义”为例,认为“五四时代的‘德赛二先生’实际上都包括在这里了”^②。这种带有明显目的论色彩的判断既在论证上难以圆洽,又与当事人的印象不符。^③更重要的是,这样从后设观点出发的“溯源”,通过对民主/科学主题的片面强调,遮蔽了当时《新青年》作为一份“青年杂志”的基本面貌。

《新青年》创刊伊始,从刊物名称到出版社告乃至正文,处处都以“青年”相号召,把“青年”作为其预想读者和服务对象。陈独秀满怀激情地表示:“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以空间位置及时间之生命。”因此,“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④而11年前陈独秀在创办《安徽俗话报》时,则是想把刊物办得人人适宜:“读书的人看了,可以长多少见识,……教书的人看了,也可以学些教书的巧妙法子;种田的看了,也可以知道各处年成好歹;做手艺的人看了,也可以学些新鲜手艺;做生意的看了,也可以晓得各处的行情;做官的看了,也可以明白各处的利弊;当兵的看了,也可以知道各处的虚实;女人孩子们看了,也可以多认些字,学点文法,还看些有趣的小说,学些好听的歌儿;就是有钱的人,一件事都不想做,躺在鸦片烟灯上,拿一本这俗话报,看看里边的小说戏曲和各样笑话儿,也有着实可以消遣……”^⑤虽然“在许多方面它还是《新青年》的先声”^⑥,但《安徽俗话报》的“读者意识”显然远不如《新青年》来得清晰和强烈,这多少也与陈独秀此前的办报经验有关。^⑦

“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⑧这是《新青年》作为一种“青年杂志”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设计。迄今的研究似乎过于重视《新青年》“改造思想”——输入新思想,批判旧传统——的意义,忽视了它在“辅导青年之修养”方面的努力。陈万雄

②《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第2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也有相似看法,见该书第5-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③周作人曾回忆,《新青年》当时“也是普通刊物罢了,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见《周作人回忆录》,第31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另茅盾、郑振铎的回忆,见下。

④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一卷一号。

⑤《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安徽俗话报》第一期。

⑥沈寂:《陈独秀与安徽俗话报》,转引自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24页,三联书店1997年。

⑦李宪瑜曾考察了陈独秀早期的“舆论经验”对《新青年》编辑思路的影响,参见《〈新青年〉杂志研究》,第12-18页。

⑧《新青年》一卷一号,“通信”·陈独秀答王庸工。

先生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早期《新青年》与《甲寅杂志》在人事谱系和思想渊源上有着直接的关系。^②更早的,曹聚仁也认为《新青年》创刊之初“只是继续《甲寅》的老路线”,是“用《甲寅》体的逻辑文学,发为《甲寅》式的论调就是了”^③。他们没有意识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对“青年修养”的注重,《青年杂志》才区别于《甲寅杂志》那种“精英论政”的言论模式,确立了自己的“特色”。这可以从包括栏目设置在内的一系列刊物形式中清楚地看出来。

《新青年》第一卷设有“英汉对译”栏目,把英语原文和文言译文并列刊出。虽然在当时这会给排版、印刷带来很大麻烦,但是陈独秀仍然坚持每期登载。就内容而言,既有泰戈尔的《赞歌》、《弗兰克林自传》等名著,又有《英国少年团规律》、《铁与血》等难以归类的文章,一卷二号上甚至登出了美国国歌,并附五线曲谱。在文章末尾大多列有注释,对原文中的典故以及生僻单词、疑难句法加以详细解释,以至于有人批评这“使《青年杂志》像是一份青年学英文的辅导读物”^④。同时,《新青年》每期都会刊登一两篇“名人传记”,但是除了托尔斯泰之外,传主大都与思想和文化无关,而是某个社会领域的“成功人士”,比如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华裔飞行家谭根、“大力士”霍元甲。尤其是连续几期介绍外国著名的军事将领,比如“德国军神”兴登堡、“法国名将”霞飞、“德国骁将”麦刚森,每篇传记都配有照片,显得很隆重。这些传记一方面大力渲染其非凡成就,另一方面也强调了这些成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远大的志向和坚忍不拔的性格,以期对青年读者有所“启发”。另外,《新青年》从第一期开始连载李亦民主持的《世界说苑》,栏目性质大体不出“环球掠影”的范围,既有“柏林之公园及娱乐场”,又有“德国社会党”,既有“罗兰夫人”,又有“巴黎之赛马”。《新青年》还经常在文章结束的余白处,嵌入一些“格言警句”,古今中外无所拘泥,一卷下来也有近三十条之多。意思大多是劝学励志、惜时向上之类,比如:“老来无学之苦,远甚于少时力学。(英国谚语)”“艰难由懒惰生,苦恼由偷安来。(弗兰克林)”“有十九次之失败,至二十次而成功,斯为坚忍。(安特生)”“争先恐后之辈,能直达前列。(巴腊克)”甚至在刊物的封面设计上,我们都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时期的《新青年》的那种“青年”气息。在色彩上,第一卷的封面采用红、绿、蓝、黑等四五种彩色套印。构图

②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20页。

③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第106-107页,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

④李宪瑜:《〈新青年〉杂志研究》,第20页。

方面，上部画有一排正在热烈讨论的青年学生，并印有法文LA JEUNESSE(青年)的字样；封面的核心部分，则是一幅每期更换的名人肖像，刊名、卷次分列左右两侧，空白处还添有各种花边文饰。整体看来，这时的封面设计要比后几卷活泼繁复得多，尤其显眼的是那幅中外名人的肖像。第一卷推出的六位“封面明星”依次是：卡内基、屠格涅夫、王尔德、托尔斯泰、富兰克林、谭根，在刊物正文里都配有其作品或者传记。这其实可以理解成《新青年》针对青年人特有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以形象的方式吸引其关注的一种策略。

以上这些都是《新青年》为“辅导青年之修养”所作的尝试。这里的“修养”所指极广，大凡“足以发扬青年志趣”、“得精神上之援助”^②者都可包括在内，比如现代知识(常识)的介绍，积极人生态度的鼓励，学习上的帮助等等。郑振铎后来描述，初创期的《新青年》“只是无殊于一般杂志用文言写作的提倡‘德智体’三育的青年刊物”^③。茅盾也认为“《青年杂志》提倡德、智、体三育”^④。这里的“德、智、体”其实就是针对“修养”讲的。茅盾还回忆说，当初他在编辑《学生杂志》时，主编曾订了一些在上海出版的“适合中学生阅读的杂志”，“其中就有陈独秀编的《青年杂志》”^⑤。按照他的描述，我们发现《青年杂志》与《学生杂志》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比如都有劝学励志的言论，科学知识的介绍，都有中英文对照的小品，成功者的传记和轶闻等等。这种相似性并不意味着两个刊物之间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因为《学生杂志》是一种明确“以青年学生为对象”^⑥或者说“以供给中学生课外知识为主”^⑦的刊物，《新青年》与之在刊物形式及编辑策略上的某些相似，则可以反过来透视出《新青年》在自我定位上的部分特征，这主要就表现在对“青年修养”的关注上。

综上所述，《青年杂志》时期的《新青年》既推重“改造思想”，又注意“辅导修养”，两者结合起来才完整地诠释了《新青年》作为一份“青年杂志”的确切内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虽然这一时期的“通信”栏目没能成为“思想”交锋的战场，但它对青年实际问题的关心和解答与其他相关栏目一起，有承载着“辅导青年之修养”的功能，这对刊物来说同样重要。而且，事务咨询类来信占据主导这一事实，反过来也可以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反映出“通信”栏目以及整个《新青年》当时相对大众化的形象。

② 《社告》，《新青年》一卷一号。

③ 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

④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第1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⑤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第125页。

⑥ 周蕙秀、涂明：《中国近现代文化期刊史》，第99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⑦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第122页。

第二章 “编读讨论时期”(第二三卷)

一 “通信”与“读者论坛”

1916年2月,《青年杂志》第一卷出齐六期之后,“以战事延刊多日”^⑧。同年9月,二卷一号出版,改名《新青年》。虽然刊名的变动出于实际的原因^⑨,但以“新”冠“青年”也未始不可以看成是对刊物本身“新形象”的期许和暗示。毕竟,首卷“连赠送交换在内,期印一千份”的销量与陈独秀创刊时“可以轰动一时”的自夸相去太远^⑩,面对自己的期待和出版方面的压力,对刊物作出某些调整势所必然。那么,“同一青年也,而新旧之别安在”^⑪?

相对于第一卷的冷清,第二三卷的“通信”栏目开始“热闹”起来。这一方面表现在通信数量的明显增加,平均每卷都是第一卷的两三倍;刊物中“通信”所占的篇幅也增加了许多,仅三卷三号一期的“通信”(占28页)就几乎是第一卷全部通信的两倍。另一方面,“通信”的性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事务咨询类来信越来越少,到第三卷时几乎已经绝迹;相应的,各类讨论性质的通信大量出现,占据了“通信”的主导。这使“通信”栏目在功能上开始由“事务咨询”向“编读讨论”转型。这些“讨论”涉及的话题各种各样,有的介绍“体育研究”(二卷二号李平),有的痛陈早婚之害(二卷三号莫美卿),有的提倡新式教育(三卷三号余元浚),有的主张练习“武功”(二卷二号潘赞化)。不过,大体上“通信”栏目也形成了一些反复争论的“焦点”,比如孔教问题和文学革命,而它们本身也是同期《新青年》最为注重的两大主题。

“通信”栏目的这种变化不应该被理解成是杂志刊行日久、读者渐多的一种“自然”现象,相反,它应该被看作是对一系列编辑策略的有意识使用的结果,反映的是这一时期《新青年》编辑方针的调整和自我形象的重构。在二卷一号上,陈独秀表示:“本志出版半载,持论多与时俗相左,然亦罕受驳论;此本志之不幸,亦社会之不幸,盖以真理愈辩而愈明也。……以后如有析理辩难之文见赐,必当照录,以

^⑧ 陈独秀致胡适信,《胡适往来书信选》(上),第3页,中华书局1979年。

^⑨ 《青年杂志》改名,是为了避免与当时上海青年会的周报《上海青年》混淆。见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2页,学林出版社1983年。

^⑩ 见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316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⑪ 陈独秀:《新青年》,《新青年》二卷一号。